

二十一世紀評論

「國學熱」的背後

「國學熱」、民族主義轉向 與思想史研究

雷頤

科學哲學家庫恩 (Thomas S. Kuhn) 認為，科學的進步並不僅僅是量的積累，而是質的飛躍，不同的科學家共同體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點、提問方式和理論體系，即不同的「範式」(Paradigm，又譯「典範」)。「範式」是一個包含各種科學、哲學、社會因素在內的綜合體。科學的進步就是「範式」的更迭，而且，舊「範式」的衰退與新「範式」的湧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有着極密切的關係^①。換言之，科學的進步與發展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不是抽象、孤立而靜態的「純」邏輯知識和理論體系的線性積累，而是深受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和歷史因素的影響，是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關的開放系統，因而要受社會、時代的巨大影響。

自然科學尚且如此，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發展與否、「熱」與「冷」，受社會和時代的影響當然更為強烈。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到1970年代末，近六十年的時間內，無論是執政前還是執政後，一直對「國學」持批評、批判態度。然而，「國學」在中國大陸遭受如此長期的批判、冷遇之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十餘年卻興起了「國學熱」，這背後必定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 中國共產黨對「國學」的批判

中國共產黨對「國學」持批判態度，這一點由來已久。早在中共建黨初期，針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共產黨人就開始了對「國學」的批判。1922年，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發表文章批評說：「文化運動發生甚麼結果呢？他不過把那些以救國為己任的學生們趕回課堂，使那些五四運動中的領袖們學着做新詩，做白話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學，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學、哲學、科學去了，整理國故

去了。」◎1924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提醒青年：「中國國勢已經危急的〔得〕了不得，而這般老學究們還在那裏提倡『國故』，這簡直是昏庸已極的事情」，「實在代表了一種反動黑暗的勢力」③。陳獨秀、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曾專門撰文批判整理國故。

1949年政權新舊交替，但這次「新舊交替」與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樣之處，在於這並不僅僅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政權更迭，而是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徹底的「革命」。按照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邏輯，一定的社會基礎要有相應的「上層建築」與之配套，一個「全新」的社會必須要有「全新」的上層建築。所以就有了隨之而來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紅旗」、「批判白專道路」、「興無滅資」等一系列針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其實，這些運動是針對所有知識份子的，因為當時所有讀書人都是「舊學校」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嚴密的邏輯體系中，執政黨和政府不承認任何學術（甚至自然科學）的獨立性，當時的主導觀點是「科學也有階級性」，認為從金文甲骨、詞章考據到遺傳學、相對論等都具有政治性④，可分為「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批判，一切舊的學術傳統都要被取代。對「舊知識份子」影響殊深的「國學」自然首當其衝。

1950年代對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書的批判所引發的「胡適思想批判」，成為建國後對知識份子進行非常嚴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內容。「國學」因而被視為「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而遭到嚴厲的批判。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整理國故」受到種種政治性指責和批判。文學史專家李長之在批判文章中一邊批判胡適也一邊自我檢討⑤：

胡適為甚麼要整理國故？這並不像有些人所抱有的那樣天真想法，以為這是在不談政治之後的學術工作，彷彿他的政治立場雖然反動，而學術工作還是有價值等等。必須指出，他的整理國故工作恰恰和他的反動政治立場相聯繫着，或者說正是體現了他的反動政治立場的。……他的整理國故、考證紅樓夢的目的是為了抵抗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傳播，是為了阻撓中國人民革命的進行。這哪裏是「為學術而學術」呢？當然，事實上也從來沒有「為學術而學術」那樣的超階級的東西存在過。……我曾聽過胡適的課，我曾長期間信仰過胡適，也曾附和過他的主張。……不久我也搞起「國故」來了，在一九三七年寫了「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書，不但在內容上把李白曲解為尼采式的超人，充分顯示了個人主義的觀點，而且那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的前夕，就客觀作用上說這類的書又是引導青年逃避當前最嚴重的現實鬥爭的。

還有批判文章認為，胡適整理國故的目的既不同於顧炎武為保存漢族的文物制度而反抗滿清統治，又不同於章太炎以此作為革命武器，「他是帝國主義的

代言人，根本沒有民族觀念；同時他又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他曾因文字而陞官，決不會因文字而得禍，更用不到逃避現實。他的目的，只是為了販賣資產階級最反動最腐朽的實驗主義，來替帝國主義服務而已！」「如其沒有正確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考證也不免誤入歧途。俞平伯、周汝昌等的紅樓夢研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⑥。另有批評者指出：「胡適的『整理國故』，其目的就在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歪曲中國人民對古典文學遺產的認識。……另一反動目的是要藉此把實用主義的毒素散布到青年的頭腦中去，變成反馬克思主義的『本領』。」「今天，我們清算胡適的治學方法，也就是要端正我們自己的治學態度。再不能株守漢學殘壘、安於支離破碎，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了。我們應當認識，只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武器，才能夠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質和其規律性，形式邏輯於此是無能為力的。」^⑦

此後，「國學」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科學」一樣，受到愈來愈激烈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外文化都作為「封、資、修」被「徹底打倒」^⑧。在局外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之下，「國學」幾成絕學。

二 「國學熱」的背景

隨着文革結束，各項學術研究漸次恢復，「國學」作為一種與社會現實關係相對薄弱的「純學術」開始獲得獨立、自由研究的空間。當然，此時「國學」只局限在學者的象牙塔中，並未成為社會熱點。但在二十世紀末以及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餘年間，各路「國學」卻突然「走紅」，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國學熱」。「國學」由「冷」轉「熱」，殊為不易，有着更為複雜深刻的背景與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國家力量的直接推動。如果沒有國家權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國學」最多只能成為知識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很難成為今日鋪天蓋地、席捲全國的熱潮。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第3版史無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發表了題為〈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的長篇報導，這標誌着國家正式提倡「國學」的開始。此文提出^⑨：

北大的領導和眾多的教師認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其一就會翻車，就不能騰飛。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我國的文化傳統。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北大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它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凝聚了中華各族人民，支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滲透在現實生活之中，對中國人的思想、行為起着潛在的支配作用。深入地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提高中國人的自

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項基礎性工程。他們認為，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尊為「國學」，並無不當。

《人民日報》在此文的「編者按」中特意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即「國學」，「研究國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⑩。僅僅兩天之後，8月18日的《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了〈久違了，「國學」！〉的短評，再次重複盛讚「國學」研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⑪。

1993年11月14日，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焦點時刻》節目又以「國學熱的啟示」為題，對「國學熱」作了詳細介紹、宣傳。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高屋建瓴，啟迪後人〉的「側記」，報導了季羨林在北京大學就東方文化和「國學」作的一次報告，這是北大團委和學生社團舉辦的「國學月」的一個重要項目^⑫。1994年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季羨林的〈國學漫談〉一文，明確告訴人們「國學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它具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色」、「它的光輝也照到了國外去」和「激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這三個方面。他尤其強調：「探討和分析中國愛國主義的來龍去脈，弘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任務。」^⑬

此外，北京大學於1992年初成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有報導說，該研究中心的工作得到了國家教育委員會和中央的重視和支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在與北大教師座談時，針對「國學熱」發言說：「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急迫任務，北大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應該肯定。……拍攝傳統文化電視片，編寫傳統美德書籍很有現實意義，有助於幫助下一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⑭

《人民日報》如此頻密地宣傳、提倡「國學」，國家領導人明確支持「國學熱」，與此相呼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央視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揚「國學熱」，報導有關研究狀況，並不斷發表「國學」／「中國文化」／「東方文明」將主導二十一世紀、拯救全人類的宏文。

「國家級」媒體的宣傳無疑具有強烈的導向意義，「國學」迅速熱遍全國。一些報紙開設了「國學」專版，一些地方政府開始祭孔，央視的《百家講壇》事實上變成「國學」的「獨家講壇」，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國學班」或「國學院」，一些中小學在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開始讀經，將是國家級、標誌性、總建築面積超過八萬平方米的「中國國學中心」正在北京建設。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從資料整理到學術研究，近十幾年來，「國學」研究也確實取得了非常豐厚的成果。2013年政府規定，具有教育、教學「指揮棒」作用的高考開始降低英語權重，增加語文權重，其目的是「淡化盲目學習英語熱，關注國學教育」，「增加國學教育」^⑮。由此，「國學」從一般的提倡，進入國家的具體制度安排之中。

三 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

國家對「國學」的明確倡導和支持，是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即所謂「六四風波」）之後開始的，其背景是海內外各派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突然重視，即「文化熱」。而執政黨和政府對傳統文化的突然提倡與強調，則有更深遠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背景。當然，這裏所謂的「轉向」，並非指執政黨完全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指其既有官方意識形態中的「民族主義」權重迅速加大。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國學」和「傳統文化」，就作為回應剛剛發生的「風波」的「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提了出來。如一份官方色彩濃厚刊物的文章所言，「……所以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時候，有些『精英』便改穿了西裝來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他們因為已經吃了牛奶和麪包，便反過來痛罵母親的乳汁是多麼骯髒，卻不想想這種乳汁曾經給他們多大的營養。傳統文化這一次所受的劫難是相當深重的，因為『精英』們已決心把它完全搞臭。」^⑩

高等院校是「六四風波」的重災區，國家教委針對高校教師和學生，在1991年專門創辦了政治理論刊物《高校理論戰線》，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何東昌發表了〈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戰線——寫在《高校理論戰線》出版之際〉作為該刊「創刊詞」。創刊號報導了1990年11月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師組成的民族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研究課題組聯合組織召開的「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與會者就近幾年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許多同志認為，近幾年來，在理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為時髦，乃至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應該認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們認為這「近幾年泛濫的民族虛無主義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社會等各個領域」；「不少同志聯繫近幾年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泛濫的實際情況指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理論界和社會上，尤其在經世未久，對傳統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學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亂，對其危害絕不可低估。」^⑪

張岱年在發言中說：「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現，也是嚮往資本主義的一種表現。」^⑫

張豈之認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有四個方面，「是『全盤西化』論的組成部分」，「是歪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產物」，「是國外某些言論的再版」，「是走極端的片面性思維方式的表現」。「今天非常需要澄清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任務。……實踐證明，歷史與民族文化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有效的理論武器，比講多少道理都有效，是民族凝聚力的強大源泉。」^⑬

李文海進一步分析說：「民族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給青年人造成的心靈創傷比直接的政治

結論更嚴重，所以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清除其影響，目前這方面的努力很不夠。……要深層次地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應首先向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開刀。」^{②0}

李侃強調：「這次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緊密聯繫，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傳統，不要社會主義，不要黨的領導，而要西化，要資本主義」，所以「否定傳統的危害性越看越嚴重，對其嚴重性要給予足夠的重視」^{②1}。

1994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提出^{②2}：

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現在，我國人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努力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統，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和人民團體，必須高度重視這項工作，並結合各自的工作特點積極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包括「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育」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並要各地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6年11月，國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共青團中央、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命名和向全國中小學生推薦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1997年7月到2009年5月，中宣部先後四次公布了近四百個「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除全國性示範基地外，各省、地、市、縣又陸續建有大量不同級別的示範基地。2011至2012年，各地開始命名第五批示範基地。這些示範基地當然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歷史內容為主體，但歷史上的重要文化、文物遺址幾乎悉數囊括，從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余姚河姆渡遺址一直到朱屺瞻紀念館、胡慶餘堂中藥博物館、潘天壽故居、馬一浮紀念館等等，均在其中。馬一浮、胡雪岩、潘天壽等曾是中共長期的批判對象，現在其故居、紀念館等竟然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這種轉變也顯示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②3}。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②4}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從增強愛國情感做

起，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深入進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教育和中國革命傳統教育、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教育，引導廣大未成年人認識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了解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和中國人民進行的英勇鬥爭，從小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②

2004年3月，中宣部、教育部制訂了〈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明確說道^③：

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行「西化」、「分化」和爭奪下一代的圖謀，……在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斷增強廣大青少年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和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必須高揚愛國主義旗幟，倡導一切有利於民族團結、祖國統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有利於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用誠實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導學生樹立以熱愛祖國、報效人民為最大光榮，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嚴為最大恥辱的觀念。……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是緊密結合的。……中國共產黨是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和創造者。……各學科有機滲透民族精神教育，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全過程，貫穿在學校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中小學德育課程和語文、歷史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要充實體現民族精神的豐富內涵。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科學等理科課程應結合教學內容，豐富中國科學家的科學成就和民族精神的內容。藝術（音樂、美術）課應包含經典民樂、民歌、民族戲劇欣賞和中國畫、書法藝術欣賞的內容。體育課應適量增加中國武術等內容。……為把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在做好經常性宣傳教育工作的基礎上，決定從2004年開始，每年9月為「中小學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提高認識，本着求真務實的精神，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的一項重要任務，擺上重要日程，切實加強領導，給予必要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各級宣傳、教育等部門要根據本《綱要》精神，結合當地實際，制訂具體實施辦法，深入學校了解情況，研究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工作。教育部門要設立中小學德育工作專項經費。宣傳、教育部門要主動與各有關部門和群眾團體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的優勢，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共同做好中小學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工作。

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五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指出：「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大力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傳統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現就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提出如下意見……對於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對於不斷發展壯大中華文化、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傳統節日中所蘊含的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是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寶貴資源。教育行政部門要研究制訂把傳統節日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具體措施和辦法，把傳統節日教育納入學校教學活動之中，推動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進課堂、進教材。」值得注意的是，〈意見〉甚至將弘揚傳統文化與「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聯繫起來^②。2007年12月，國務院正式將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定為國家法定假日。

在這種方針指引下，「國學」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思想教育」緊密聯繫起來。例如有論者提出：「堅持古今貫通的原則。也就是說宣揚愛國主義既要進行系統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學，力求重點突出，取材恰當，通俗易懂；與此同時又要注意突出時代特徵，大力宣揚改革、開放時期湧現出來的愛國主義典型事迹，使青年學生們明白當今新時代的愛國主義也就是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③又有說法認為：「我們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一定要挖掘傳統文化有關愛國的主張和思想中的合理成份與合理內容，並同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其實，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現代愛國主義教育最基礎、也是最根本的內涵。」^④於是，「國學」成為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⑤。

近年來，鑑於「國學」進一步與「國家文化安全」聯繫起來，有論者宣稱^⑥：

不論各家怎麼說，國學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這一範疇是一致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基，是中華民族共同認同的基礎，傳統文化彰顯出來的民族主體品格是時代精神的載體，是中華民族今天能夠實現偉大復興的主體條件。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國學熱」的興起有利於繁榮中華文化，提升中華文化的整體實力，固本強根，切實維護我國國家文化安全。

依照這一思路，承認和強調「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始終是提倡「國學」和「國學熱」的深層動因。今天，我們對「國學」的討論與定位仍然不能脫離「國家文化安全」的視角^⑦。

事實表明，主流意識形態自1989年下半年起開始作出重要調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科學社會主義之外，以強調「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增添了濃重的「民族主義」，開始更多地從傳統文化中吸取政治理論資源，其話語具有日漸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這種大幅度調整，肇因於深刻的「合法性」需求。

「合法性」(legitimacy)，又譯「正統性」、「正確性」、「正當性」或「合理性」。在政治學中，國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並非指符合法律條文，也不在於統治者自己宣稱統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整套全社會、包括統治者和絕大多數被統治者

認可、認同的道理、規則和行為標準體系，即統治者權力是否被廣大社會成員發自內心地加以認同的問題。公權力是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之惡」，但公權力若僅依靠強制力量並不能維持社會的持續安定，因此任何公權力必須製造出一套詮釋系統，把國家形態與社會結構概念化、合理化，使社會所有成員都相信那樣的結構形式與內容是合理的，即統治者的統治權力是應當的、正當的或命定的。韋伯認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背後包含暴力、經濟等因素，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要素——對正當性的信仰」；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育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④。伊斯頓 (David Easton) 認為，統治者獲得被統治者支持有三條途徑：「那種不直接與具體的物質報酬、滿足或是強制 (負報酬) 相連接的支持，可以通過下面三種反應產生：第一，努力在成員中灌輸對於整個典制及為之服務的個人的一種牢固的合法感；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徵物；第三，助長和加強成員與政治共同體認同的程度。」^⑤簡言之，即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著名的論斷：「合法性意味着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⑥

在「合法性」的重建中，「國學」／傳統文化的迅速復興顯示了在全能體制國家中國家權力對文化的高度掌控。在重倡傳統文化中，「國學」成為前導，被納入民族振興、愛國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國家文化安全的話語系統。這種將「國學」／傳統文化編碼織入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同時顯現出國家權力與學術、文化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需要，甚至愈來愈倚重。近年來，以「中國精神」、「中國形象」、「中國文化」、「中國表達」為標誌的一系列政治宣傳畫出現在全國城鄉。它們在形式上充滿了中國元素，確實是「中國形象」、「中國表達」。這些宣傳畫與文革宣傳畫的「紅、光、亮」形成鮮明對照，由此也可看到傳統、民族形式、民族主義的轉向。

2010年，由幾位「國學」／儒學推動者撰寫的《陣地戰：關於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一書，將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復興定義為「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們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理論家、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明確提出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幾乎完全不同，當代中國形成了「中華文化陣營」，與「西方文化陣營」正在進行爭奪文化霸權的「陣地戰」。該書指出，「『五四運動』以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拋棄以及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大規模入侵，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主性，缺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有效的意識形態、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對外不具有與西方世界匹敵的『軟力量』，對內不具有能夠被全體人民共同認同的『文化領導權』。『文化民族主義運動』既是重建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確立社會規範和倫理道德，乃至尋找精神信仰的過程，也是在文化領域與其他意識形態開展『陣地戰』的抗爭，同時也是對中國軟力量建設的積極嘗試。」這兩個陣營不僅文化性格完全不同，各自的文化淵源也不同，因此，

「它們的行動目標存在顯著差異，甚至是對立的。中華文化陣營的目的是建立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驅除西方文化勢力，而西方文化陣營則希望確立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兩者的社會基礎不同，而且聯盟策略也不同。例如，對中華文化的一致的態度，決定了民間和政府的親和性。所以中華文化陣營是親政府的，而黨政官員是中華文化陣營的成員，至少也是盟友。而西方文化陣營則是反政府的，至少反對『大政府』。」由此看來，「當下的文化領導權爭奪戰，既是一場階級戰爭，又是一場民族戰爭。」「要建立中國的政治合法性理論，向外求索沒有出路，必須返回過去，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出路」，所以「中國共產黨從『五四』傳人轉變為儒家復興的積極推動者」^⑥。

四 嵌入與脫嵌：思想史方法論

多年前，筆者在〈今天非常「法蘭克福」〉這篇文章中說過，同一種理論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產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樣的^⑦：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說，學者對一種「知識」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尤應加以注意。一種學說、觀念如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個問題一旦提出，我們就離開了「純學理」的內在整體性，進入了學理、觀念在特殊歷史脈絡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是如何被運用的這一層次。這樣，我們必然或說不得不離開「純學理」、「純觀念」的領域。因此這時我們重視、追問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觀念的「普遍」意義，而是要解釋、說明、強調這些觀念在「當事者」所處的特定「脈絡」(context)中是如何顯現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義。

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層面而言，對一種思想的研究不能離開「脈絡」來分析「文本」。如果僅作脫離脈絡的「純文本」分析，由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說的名稱的「家族相似性」，對兩個名稱完全一樣、但實質完全不同的「文本」就會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如前所述，當前的「國學熱」是傳統文化復興的核心內容，而傳統文化復興的實質是「文化民族主義」，是為了突出中華文化的「特殊性」，批判、反對「普適價值」。然而，胡適在九十餘年前也主張和提倡「整理國故」，但他的主旨之一卻是要通過整理國故來闡明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科學方法」，為「科學」在中國尋根，並藉此證明「科學」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容的「舶來品」，從而論證中國傳統也有「科學」，證明中國並非自外於世界普適價值，或者說，是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而努力。同為「國學」，二者指向正相反對，「能指」(sign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反^⑧。這說明一種思想，尤其是社會性思想，從來都是與社會和歷史緊密糾結、

纏繞在一起，同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會被不同地「使用」。正如在近代中國與日本，儒學被不同地「使用」，其作用與結果自然大不相同。

鴉片戰爭後，列強的船堅炮利、電報鐵路，是國人對「現代」最早、最直觀的感受，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此主張及其後引進大機器生產、學習近代科學知識、興辦新式企業的「洋務運動」，卻被「儒學正統」以「夷夏之辨」斥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儒學正統」還以「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為理由，將「技術」貶為「奇技淫巧」。

李鴻章提出軍務緊迫，要架設電報，「儒學正統」卻質問：「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事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邱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³⁹

在經濟政策上，「儒學正統」以《論語》為據，堅決反對此時剛剛出現的「重商富民」的思想，反對興建鐵路，論說機器生產是「末富」，傳統勞作才是「本富」；現代工商業是「末富」，傳統農業耕織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絕機器生產和工商業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是捨本逐末：「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其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用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臣聞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奈何以中國禮義之邦而下同外夷之罔利乎？」⁴⁰「中國自強之道，與外洋異。外洋以商務為國本，中國以民生為國本；外洋之自強在經商，中國之自強在愛民。」⁴¹「夫中國所恃以為治者，人心之正，風俗之厚，賢才蔚起，政事修明也。……泰西各國，以商為主，凡所造作，施之彼國則為利，用之中國大抵皆姦黠者蒙其益，而良懦者受其害，鐵路乃其一也。」如果鐵路推廣開來，「勢必驅良懦盡化為姦黠，是足壞天下之風氣」⁴²。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與保守派的爭論中，保守派掌握了「儒學正統」的話語霸權，總是從「禮義綱常」、「夷夏之辨」的高度來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當位高權重的洋務大員在這種「儒學正統」前都大嘆其難、大搖其頭時，近代中國的「反傳統」至少是「勢所必至」了。

與近代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儒學在近代日本並未成為接受新事物、發展工商的障礙，反被闡釋成一套促進工商的話語體系，其「開山之作」便是有日本「實業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所著的《論語與算盤》。1840年出生的澀澤榮一1867年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後又在歐洲遊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他以後經營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後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辭職「下海」，投身實業。他創立了銀行、造紙廠後逐步擴大經營範圍，業務遍及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築等眾多領域。

從書名分析，《論語》代表仁義、倫理和道德，而「算盤」當然是「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的「利」的象徵。澀澤榮一認為傳統上人們總是把「義」與「利」對立起來，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手段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有極大的害處。因此，澀澤榮一希望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因此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於道德有虧。

他寫道：「我始終認為，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係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強調，「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他認為，後儒對孔子學說最突出的誤解是有關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榮一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的「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對孔子「義利觀」誤解最嚴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程朱理學。它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由於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因此，必須認識到，仁義道德搞不好也會導致亡國。」

但是，利己主義也會導致亡國，《大學》中有一句話：「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也是不能忽視的。「總之，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澀澤榮一反覆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是一致的，所以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也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採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⁴⁹。

在近代日本和中國的不同闡釋和實踐中，同一部《論語》便具有了不同的「實在意義」。澀澤榮一對《論語》的闡釋拉近了它與「算盤」的距離，因此，進入「近代」的日本無需批儒。而近代中國語境中對《論語》的闡釋且不說是進一步擴大了它與「算盤」的距離，至少是使二者的距離更加僵化固化，更難調和；而這種種闡釋卻是作為「真理」、「聖道」而傳達、散播的，其後果自然是成為引進大機器與新式工商的阻礙。恰恰是對《論語》如此闡釋，埋下了進入「近代」的中國的啟蒙者不得不也不能不「批儒」、「反儒」的伏筆。

傳統、經典的「實在意義」是在權威闡釋和社會、歷史的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千百年來對社會一直發生影響的思想尤其如此。其「原本」不可能如某種「標本」那樣冷藏、冷凍起來一直「保鮮」、保持其「純真」，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必然要被「污染」（否定性修辭）或被「發展」（肯定性修辭）。研究、探尋一種思想「原本」的真義當然有意義，但更有意義的是由此展開對它是如何被運用（無論是「污染」或「發展」）的研究、探討。思想史研究應將觀念嵌入具體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而不是「脫嵌」，對觀念作「純文本」解讀；更不應當再反過來，將文本、經典的「脫嵌式解讀」當作真實的「歷史」來論述。

「國學」／傳統在歷史與社會現實中的複雜關係，再次提醒人們深入思考何為傳統、如何解讀傳統、傳統被如何使用，其「所指」究竟何在。

註釋

- ① 庫恩(Thomas S. Kuhn)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② 國燾：〈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嚮導》，第12期，1922年12月6日，頁98。
- ③ 華男：〈受「國故毒」的學生聽着〉，《中國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頁1。
- ④ 摩爾根(Thomas H. Morgan)的遺傳學理論在1950年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文革期間分別受到激烈批判。
- ⑤ 李長之：〈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載三聯書店編：《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集編)》，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215、216、225。
- ⑥ 吳文祺：〈批判胡適派的考證方法〉，載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編：《胡適思想批判資料集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5)，頁279-80、281。
- ⑦ 金應熙：〈胡適的治學方法和其反動本質〉，載三聯書店編：《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集編)》，第三輯(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259、266。
- ⑧ 所謂「封、資、修」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學、幾乎所有傳統文化都屬「封建主義」。
- ⑨⑩ 畢全忠：〈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人民日報》，1993年8月16日。
- ⑪ 文哲：〈久違了，「國學」！〉，《人民日報》，1993年8月18日。
- ⑫ 王之昉：〈高屋建瓴，啟迪後人〉，《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日。
- ⑬ 季羨林：〈國學漫談〉，《人民日報》，1994年2月16日。
- ⑭ 趙為民：〈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活動贏得國內外好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頁121。
- ⑮ 李江濤、丁靜：〈將英語拉下「神壇」？——透視北京中高考改革降低英語權重〉(2013年10月21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1/c_117808627.htm。
- ⑯ 金開誠：〈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增強愛國議思想感情〉，《群言》，1989年第12期，頁5。
- ⑰ 任青、史革新：〈「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綜述〉，《高校理論戰線》，1991年第1期，頁77。
- ⑱ 張岱年發言，參見〈批判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發言摘編〉，《高校理論戰線》，1991年第1期，頁26。

- ⑲ 張豈之發言，參見〈批判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頁27-28。
- ⑳ 李文海發言，參見〈批判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頁29。
- ㉑ 李侃發言，參見〈批判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頁29、29-30。
- ㉒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4年第20期，頁853。
- ㉓ 參見百度百科之「愛國主義教育」條目。
- ㉔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 ㉕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2004年3月23日。
- ㉖ 〈中宣部 教育部關於印發《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04年第4期，頁40-44。
- ㉗ 〈中宣部 中央文明辦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05年第9期，頁19-20。
- ㉘ 易啟洪等：〈中國傳統文化與高校的愛國主義教育〉，《江西農業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頁49。
- ㉙ 崔乃林、黃寶先：〈傳統文化與愛國主義教育〉，《山東省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66。
- ㉚ 張永：〈「國學熱」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啟示〉，《中國市場·學術論叢》，2007年第3期，頁59-60；任靜：〈「國學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啟示〉，《學理論》，2010年第25期，頁282-91；王芸：〈「國學熱」現象給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帶來的思考〉，《銅陵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頁123-25。
- ㉛ 蘇娟：〈近年來國家文化安全熱點問題分析〉，《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頁42。
- ㉜ 陳斐：〈國學與國家文化安全〉，《文化藝術研究》，2011年第2期，頁51-56。
- ㉝ 韋伯(Max Weber)著，閻克文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19。
- ㉞ 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等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306。
- ㉟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張博樹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188-89。
- ㊱ 康曉光等：《陣地戰：關於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16、31-32、52、55、49。
- ㊲ 雷頤：〈今天非常「法蘭克福」〉，《讀書》，1997年第12期，頁63。
- ㊳ 詳見雷頤：〈名同實異：胡適的「整理國故」與大陸當代「國學熱」比較〉，載潘光哲主編：《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74-94。
- ㊴ 〈光緒元年九月初二日工科給事中陳彝片〉，載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330-31。
- ㊵ 〈光緒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奏〉，載《洋務運動》，第六冊，頁152-54。
- ㊶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奎潤等奏〉，載《洋務運動》，第六冊，頁212。
- ㊷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學士文治奏〉，載《洋務運動》，第六冊，頁216。
- ㊸ 以上內容參見澀澤榮一著，王中江譯：《論語與算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頁3、4、173、88、76、89。